

SPEAKER: Cheng Yizhong (程益中)

DATE: January 20, 2011

PLACE: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一個報人的反思

(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)

先講兩個故事。

第一個故事：我週一從廣州出發來香港，途徑我老東家南方報業集團門口，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裡喊冤請願。這是在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經常見到的場景。按理說，中國老百姓喊冤應該去法院，請願應該去政府；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法院沒門，政府沒門，弄得不好還要被抓進去，申不了冤、達不成願事小，失去人身自由、甚至生命不值得。所以他們只好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請願。但是為什麼是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，而不是去其它的媒體集團呢？我想這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後邊我會觸及這個問題。

第二個故事就是樂清錢雲會車禍致死案。政府下結論說是普通交通事故，但是公眾輿論普遍不認可，鬧得沸沸揚揚。有很多網友也逼我表態，要我斷定這是車禍還是謀殺。我又不是神探，我只是公共知識份子，所以我不輕易斷案。但這不妨礙我發言。我已經超越對真相的追問和探究，看到其中隱含的更嚴重問題。為什麼當局說什麼、怎麼說都沒人信？為什麼強大得不能再強大的國家機器百口莫辯、還沒有我這個被當局打壓的個人講話有分量？為什麼我一個人發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過整個國家機器？道理其實也不複雜，很簡單，無非兩點：淺層原因是當局一貫撒謊成性，長期奉行愚民政策，從不講真話，也不准說真相，毫無誠信可言，道德上完全破產；深層原因是掌權者雖是人民供養但又非人民選出，掌權者的權力來自暗箱操作、暗室私授，既不許言論自由，又不許司法獨立，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腳。道德上破產，法理上站不住腳，這樣一來，真相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，信任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，怎麼服眾？怎麼能信？這個事件暴露出我們這個國家社會存在的深刻危機。如何重建信任、重建權威，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。這個故事又跟第一個故事相映成趣，有某種隱秘的關連。

今天我就不講客觀和外部的環境，不批評中國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，單從我曾經作為中國報業的從作人員，從一個總編輯的角度，來談談我的一點反思。

我講九個問題：

第一個問題：我們在中國大陸可以言說到什麼程度？

中國大陸媒體從業人員遇到的首要問題，就是到底什麼話是可以說的，什麼話是不可以說的，都很糾結很傷腦筋。這也是大陸所有人很糾結很傷腦筋的一件事。這聽起來很荒唐、很不可思議，都二十一世紀了，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，沒有說話的自由，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，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此感到不堪回首。我今天不講這個，而是講我們主觀怎麼認識和對待這個事實，怎麼認識自由和反抗，知道自己的籠子有多大？底線在哪裡？天花板又在哪裡？

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實只有一個，就知道我們的籠子其實不止我們想像的這麼小。別人都奇怪我為什麼這麼熱愛自由，其實是我因為我心中沒有籠子。報人最大的禁忌不在於被奴役，而是自我奴役，不是被審查，而是自我審查。所以報人最高的職責是想方設法把籠子做大，想辦法逼迫當局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；而最低最低的責任是要把籠子裡的空間用盡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空間還沒有用盡。很多時候我國還是處於無知和蒙昧的狀態，對一切都敏感得要死；一個人要幹多少壞事、要做多少惡、要處在多麼不義的立場，才敏感至此！脆弱至此！當局裝聾作啞，愚弄人民，那是當局不負責任和無恥；我們自己還是要對自己負責任。他敏感，你可以不敏感，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，這樣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。中國大陸的媒體有給當局和社會脫敏的義務，我們自己要百無禁忌，越是敏感的話題越是多提一提，就不敏感了，這對社會的健康是大有益處的。

這裡我要特別強調：在不違憲、不違法的前提下，我們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，遠遠大於我們已經使用的言說空間。1982年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35條明確規定了中國公民依法享有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。只要我國憲法和法律沒有公開禁止言論自由，那麼我們的自由還是在那裡的，倘若我們不使用、不爭取，那就是我們的責任。我幾次由海外歸國過關時，海關要查扣我帶的圖書，我都要質問他們憑什麼？有哪條法律規定公民可以看什麼書、不可以看什麼書？是誰有什麼權力決定別人可以看什麼書、不可以看什麼書？

如果我們放棄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不用，而是處處自我設限、自我審查的話，那麼我們被奴役、被損害就是自找的。在中國從事媒體行業，尤其是當總編輯的，要有這個使命感和責任意識。但如果你是為了了一己私欲，為了當官，那就另當別論，你可能不是很適合這個職業、這個職位。

第二個問題：辦報的首要問題到底是什麼？

在中國內地辦報時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問題是能不能和給不給辦的問題，是輿論環境問題。覺得輿論環

境太差了，辦不好，不給辦好和不能辦好。或者就是糾結技術問題，認為首要問題是怎麼操作才能把報紙辦好。這樣想問題是遠遠不夠的。

我認為首先還是想不想和願不願意把報紙辦好的問題。只要你想、你願意把報紙辦好，在中國你就能把報紙辦好；只要你辦的報紙，堅持獨立公正客觀的立場，不參與製造和宣傳謊言，不助紂為虐，不愚弄公眾，不掩蓋真相，你的報紙就一定是大陸最好、最成功的報紙！你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和下定決心把報紙辦好，而不是簡單地說客觀環境不好，或者埋怨輿論監管太嚴。我覺得主觀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準備。為什麼那些荒誕的、反智的、無良的、傷天害理的新聞禁令，還會得到貫徹執行，還有人買帳呢？我們應該團結起來，反抗！去衝破這個由謊言和卑鄙編織的牢籠！把套在人民頭上的這些紙枷鎖徹底撕碎！這樣的禁令存在，天理不容。

我舉個例子：汶川地震，首先照例想的是趕緊發禁令，馬上開會強調，除了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，其它媒體不得擅自到現場採訪和發佈報導，下面有別的中央媒體領導站起來回話：我們的記者已經出發，快到現場了。上海靜安大火，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許報導、不得評論，只能統一發通稿。再往前，非典的時候，他們也是一道禁令接著一道禁令，一個謊言接著一個謊言。最終禍國殃民啊。

不知道這樣做是基於什麼樣的道理和邏輯？這樣的時代，這麼重大的事件，不是想著怎麼充分報導，而是想著怎麼不要報導，多麼荒誕啊。這樣的禁令，對政府的威信，對當局的名聲，對當事各方，對誰都沒有好處，都是有害的。我們為什麼不說不！我希望大家都要敢於對這些喪盡天良的禁令說不。在資訊公開這件事上，衝破禁令的沒錯，錯的是發佈禁令的。要是全國的媒體都對這些禁令說不，看他們還怎麼野蠻、還怎麼專制。

另外，我覺得媒體要有很強的大局意識和政治意識。像溫家寶七談政改，我看國內只有瀟湘晨報等兩家報紙跟進報導、做出了適當的反應。不少媒體都是自我審查，都在等著上邊指示，結果可想而知，把溫總理害慘了。他就像《讓子彈飛》裡的張麻子，高喊攻打黃四郎，幾次喊哪沖啊都沒有人應沒有人跟。一個七十歲的老人，四十天之內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，愣是沒有媒體呼應，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兆頭，說明我國的媒體沒盡到責任。還遠遠沒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啊。

所以我覺得辦報的首要問題是職業理想、道德勇氣和政治情操的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：報紙的終極價值在哪裡？

有的報紙賺錢，有的報紙不賺錢。為什麼？這是報業的內在規律在發揮作用，是報紙的終極價值決定的。報紙的終極價值就是監督掌權者、制衡公權力、落實知情權，是公眾需要報紙和報紙存在的理由。客觀、真實、獨到、獨立、公正、公開，這就是報紙的價值。所以老一代的報人說，報紙有不可以說的真話，但是絕不可以說假話。這當是一條底線，不能突破的底線。

我想光這不突破底線還是遠遠不夠的。我想在中國這樣權力通殺的人治社會，在這個政治不文明、制度不完善、法制不健全的特殊歷史時期，報紙在監督掌權者、制衡公權力、落實知情權方面，具有不可替代、不可或缺的作用，尤其珍貴。

我認為中國現在最珍貴的是公信力，比黃金還珍貴。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到南方報業集團去喊冤請願，這說明公信力太珍貴了。為什麼國家權力機關公佈錢雲會之死真相的時候沒人相信，說明缺乏公信力。只要媒體堅守公信力至上這一點，它就能獲益，就不僅能賺大錢，還能建大功、立大德，就能為中國的政治文明進步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發揮積極作用。我覺得這是報紙實現價值唯一路徑。我對此體會很深。

另外，我覺得現代死板的財務制度，是不利於好媒體產生和發展的。那些只盯著財務報表和投資損益的老闆，是不可能辦出好媒體的。我所幸的是當年沒有碰到這樣目光短淺的老闆，他們沒有在財務上給我斷水斷電，我們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國最好的報紙，只要全中國最好的人才，給他們最好的平臺和待遇，其它的、尤其是財務報表之類的就不管那麼多，所以才有今天。

第四個問題：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？

我們在辦報紙的時候一定要想好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。我在1995年起草南方都市報基本大法的時候，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漸次為制度、人才、產品。現在我想調整為：人才、制度、產品。有什麼樣的人才，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，因為制度由人設計、發展和執行，人才優劣最終決定制度優劣，所以人才的優劣，特別是當家人的優劣，直接決定制度的優劣，這和國家是一樣的，始終都需要有一個制度的先驗者、一個制度之父；有什麼樣的人才、什麼樣的制度，自然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。

這裡特別需要闡明的是，一般都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產品，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，其實我覺得需要顛倒過來，產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，人才、制度都比產品重要。

太多的社長和總編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該放的产品上，整天想的只是不違反新聞宣傳紀律、讓領導滿意，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錯別字上，這都是不合格的、不負責任的，是對社長和總編輯職責的諷刺。我認為好的社長和總編輯，應該把人才培養、制度建設放在比產品生產更加重要的地位。

第五個問題：企業到底要對誰負責？

企業、報業到底要對誰負責。不要覺得這個問題不重要、和我們沒有關係。我在設計南方都市報制度大綱時開宗明義，南方都市報的企業目標第一條，就是對員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負責，要讓員工在南方都市報這個平臺獲得最大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價值、獲得最高的經濟收益和勞動回報，讓員工及其家人以南方都市報為榮的同時，過上富足和有尊嚴的體面生活。不要認為員工的個人福祉和公眾福祉和利益無關，而是大有關係的。好的領導人就是要通過好的制度設計，促使企業內各種要素良性互動、相得益

彰。

第二是對合作企業和上下游企業的員工和他們額家庭幸福負責，讓紙張供應商、印刷服務商、廣告合作商、發行供應商感到光榮和幸福。

第三才是對顧客負責，這裡需要強調我並沒有把「顧客至上」掛在嘴上。我認為「顧客至上」如果不建立在以上兩點之上，難免會是虛偽的、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。如果一個企業只是強調顧客至上，而它的員工卻一肚子苦水，他們對顧客擠出的笑容將是多麼悲慘。如果一個企業員工表面上對顧客點頭哈腰，背地裡卻對自己的老闆恨之入骨，那顧客至上還有什麼意義。報業的顧客一個是讀者，一個是廣告主。讓讀者覺得看我們的報紙不丟人、不掉分，看我們的報紙顯得有獨立性、有判斷力，讓讀者和廣告主覺得我們的報紙剛正不阿、不作惡、不助紂為虐，就是對讀者和廣告主負責。讓我們的廣告合作商以參與見證報紙的發展壯大為傲、為榮，很重要。

第四是對促進所在地區的繁榮和幸福負責。我敢說，作為矮子中的高個子，廣州差不多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；我又敢說，廣州之所以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，重要一條就是有《南方週末》、《南方都市報》等這些敢於說真話、講真相、監督政府、為民請命的報紙。總會有人說我們報紙污蔑廣州的大好形勢、損害了廣州的形象，但吊詭的是，正是我們的報紙，為這個地區贏得了好聲譽和好形象，我們污蔑廣州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；同樣的，太多的媒體每天都在對當局和當地歌功頌德，但最終結果又怎麼樣呢？朝鮮的媒體說過自己一句壞話嗎？怎麼朝鮮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劇？再舉一例，當年《南方都市報》對深圳也差不多堅持了“以負面報導為主”的方針。後來南方都市報讓我談當年報導深圳是怎麼想的，我說打個比方：你如果愛一個美女，看到她臉上有污漬，是指出來還是不指出來更愛她呢？我矯情地說一聲，《南方都市報》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愛一個地方，參與地方的建設，對城市繁榮和公眾幸福負責。有讀者寫信來說如果廣州沒有你們這樣的報紙就沒有那麼可愛。正是報紙揭露公權的肆虐、官員的貪腐，才讓他們覺得廣州相對還是安全的，畢竟這屋裡有這麼一隻貓，不停地走著叫著，也經常逮到耗子。

第六個問題：企業管理的秘訣在哪裡？

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都是有問題的。我在參與創辦《南方都市報》、《新京報》的時候，主要精力都花在企業管理上。企業領導人職責何在？我認為不能事無巨細，雞毛蒜皮，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報導、一個語句上，這是很糟糕的。

一個好的企業掌門人首先是一個預言家，他不應該管今天的事，他應該管明天、明年、後年、三五年後的事。他要有長遠的設計和規劃，同時有擔當的勇氣和高瞻遠矚的能力，對於所在的行業要有異於常人的洞察力。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，觀察業界。所以——

好的企業領導人首先是預言家，其次應該是制度設計師、模式構架師、環境營造師和文化培育師。他不必要是記者、編輯和校對師。南方報業集團當時最好的一點就是鼓勵我們制度創新。在這樣一個傳統的國有事業單位，讓我們放手去設計一套全新的制度，那真是一國兩制啊。我當時做的最大膽的一件事，就是打破原有國營體制，廢除既有的國企工資體系，設計出一套完全建設在個人價值，即從業經驗、過往業績的基本工資體系，量化和質化考核體系，通過寫稿發稿編版的數量品質，進行嚴格打分評級。我覺得這個重要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相當於破解國有企業管理難題的一把鑰匙。

這說明制度設計是很重要的，制度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。每年一到兩會的時候，就說我們國家的制度是世上最好的，絕對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度、絕對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，兩個絕對實在令人絕望。世事無絕對！怎麼能說得這麼絕對呢？這不符合任何理論和學說，除非獨門秘笈和絕世法寶。制度是可以批評的，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，制度不是宗教，也不是魔咒，怎麼就摸也摸不得、碰也碰不得？

扯遠了，回來。我覺得領導人知道什麼不該管，比知道什麼該管更重要。很多領導人就是因為管了不該管的，所以沒有管好該管的。

第七個問題：怎樣才能把報紙辦好？

我的思考模式經常與人不同。

有一個故事被很多人說過。南方都市報創辦初始，報業集團也沒給什麼錢，也沒有投資的概念，第一年掛賬經營虧了八九百萬，很多質疑就來了，要我回答。我當時就給大家講了一個關於賽跑的故事。說是三個人萬米賽跑，第一個是《羊城晚報》，已經跑了八九千米，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量，多年雄霸中國報業龍頭地位；第二個是《廣州日報》，也跑了七八千米，上升勢頭還很強勁，如日中天；第三個就是我們《南方都市報》，剛剛臥到起跑線上。現在的問題是，我想當冠軍，這該怎麼跑？答案只有一個：換一個規則跑。如果按照原來的規則跑，我們爭第一應該說是不可能的；但是如果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，就一定有可能。這就是我解決辦好這張報紙的一個小小的竅門、一個大大的秘密。原有的中國報業殿堂沒有我們位子，我們只好建造一個殿堂供奉自己。

做一個行業，當領跑者其實是最自由的，最無拘無束的；當追隨者其實很慘，很不輕鬆；因為追隨者永遠不知道領跑者往哪裡跑？怎麼跑？前面是拐彎還是掉頭？是剎車還是加速？這一切，規則和主動權全掌握在領跑者手上；而追隨者的命運就是老二。在中國搞報業，當領跑者其實是比較容易的。因為中國最缺的就是公信力，報紙只要有公信力就能做到第一，真的不難。

第八個問題：做報紙難在何處？

報業又肯定比其它行業更難。

一難：與其它行業不同，報業必須進行“二次銷售”才能獲益。首先是要把報紙銷售給讀者，也就是發

行環節，但這是反利益的行為，銷的越多，賠的越多，基本沒有靠發行就能賺錢的報業。而其它行業的商品銷售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的，賣多少，賺多少，控制好成本和定價即可。報業還要把廣告賣給廣告客戶，才有可能獲利。並且只有第一次虧得越多，第二次才能賺得越多。所以這是一個很難把握好平衡點的蹺蹺板。兩次定價是拿捏的關鍵：對讀者，是要訂好報紙訂閱和零售價；對廣告客戶，要訂好廣告版面價和遊戲規則。

這裡要特別提一下南方都市報對廣東報業的一大貢獻，就是防止廣東報業的價格戰和惡性競爭。南方都市報是中國第一家零售定價一塊錢的報紙，之前廣東的報紙都是定價五毛錢、打折三毛錢，南京甚至還有定價一毛兩毛還打大折頭的，幾乎免費了。南方都市報1998年就定價一塊錢，當時正面臨新快報創刊的凌厲攻勢，逆流而上，既透露出對自身品質的自信，也成功地把對手和公眾帶入品質競爭和關注內容品質的層次，從而避免兩敗俱傷、一損俱損的競爭局面。後來在創辦新京報時，我們乾脆一步到定位定價一塊錢，我想當地那些定價五毛錢的報紙基本都鬆了一口氣，同時也在等著看我們笑話。但我們沒有讓他們看笑話。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，都創造了後來競爭者以更高定價參與競爭並獲得商業成功的範例。

其實我的經驗只有一條：高定價和提價，發行和廣告都高定價和提價，並且堅持價格剛性。

二難：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。這是報紙的特殊商品屬性決定的。而管理層就必須要兩者均衡發展。當二者抵觸時，一定要堅持社會效益。南方都市報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。南方都市報創辦伊始，批評深圳一家企業，這個企業老闆說我給你們報紙投放八百萬廣告吧，被我們拒絕了。還有當年南方都市報鑒於醫療衛生廣告民憤極大、陷阱很多，毅然決然在全國首倡不刊登包括醫療衛生廣告在內的四類不良廣告，廣受好評：一份以市場為導向的報紙，首先舉起了抵制醫療衛生等不良廣告的大旗。

三難：在中國辦報，要做到群眾和領導都滿意。但領導很難滿意。我想要做到領導不把你弄死，或者至少不敢隨意把你弄死就行了。在現在的中國，領導滿意了群眾就很難滿意，群眾滿意了領導就不滿意。這不是我們的問題，也不是群眾的問題，而是領導的問題。他的利益計算方式和你的不一樣。在中國做媒體，要是全部做到領導滿意，那麼這份報紙也就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了。這是我們這個制度決定的。我們就是一方面盡力把工作做好把報紙辦好，但又不能讓領導把你幹掉，這是很難拿捏的。當年我們的做法是，給他一個激動人心的產品，一個無比激動人心的發展方向，還有激動人心的現實回報，領導一看這麼多的錢，這麼多的發行量，這麼好的社會名聲，冒一點險就冒一點險吧。所以也要說，在中國辦一張好報紙真的太難了。

第九個問題：報紙如果什麼都做不了怎麼辦？

至少改版！

不停改版，優化版面，改良設計包裝，也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辦法。產品設計也是品質和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並且決定消費者的第一印象，往往見效最快，不可小視。

總結一下，我講的九個問題，是三個層次：前三個問題是講“取勢”，就是“因勢利導、順勢而為、乘勢而上”，我在南方都市報的時候曾做五年、十年規劃，每年年終統計，所有資料與規劃高度吻合，這是我對自己滿意的一點，這說明我對“勢”判斷得准；中間三個問題是講“明道”，就是“注重策略、科學管理、有章有法”；後三個問題是“優術”，就是“追求卓越、拒絕平庸、精益求精”。

這都是我和我的同仁的經驗：拒絕平庸，追求不凡，渴望完美。

【現場提問】

提問：我是港大商學院的，今天聽您說了很多商學院的東西。我對港報不是很滿意，似乎很平庸。您對港報的評價怎樣？

答：我想可以也應該辦的更好。我不認為香港報紙只有一種辦法，也不覺得所有的人只有一種趣味。所以要從這裡尋找突破口。如果給我機會，我認為可以在香港辦一份非常高雅、高品質的、嚴肅的報紙。香港這麼好的地方，這麼好的輿論環境、市民社會、公民意識、經濟條件，辦好報紙是不成問題的。當然我也不拒絕八卦，問題是不能都是八卦。

提問：現在的國內媒體都關注標新立異的東西，比如說農民工奇特的討錢方法，才能引起注意。你對此怎麼看呢？

答：我覺得這還是挺有創意的，因為這樣的新聞太多了。就像最近的新聞，一個男子沒有買到火車票，於是裸體跑到火車站站長辦公室示威。我挺敬佩這樣的維權意識和行為藝術，這也能讓他在新聞中脫穎而出。媒體報導這樣的新聞是沒有問題的，多多少少是有益，至少是無害的，總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和公平吧。如果沒有當年熊德明讓總理幫忙討薪，那麼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就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。所以我們都變著法子逼社會改良。

提問：你說國內的媒體想要達到“制衡公權”的終極目標要怎麼做呢？是去衝撞籠子嗎？

答：從憲法立場看是沒有問題的，但是中國還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，還是一個人治的國家。但是我們不能等客觀條件具備了才去做事，而是應該通過合法的途徑和程式，通過新聞操守和操作規範，不斷嘗試。

提問：能一直在說媒體要突圍，但是在中國這種至上而下的環境裡面，中國媒體的趨勢是什麼？錢老師曾提到，中國的管制進入到一個control 2.0的階段，變得更聰明，機制化。但是我們還是看到荒謬的禁令。您有什麼看法？還有，那您對政改有怎樣的預測？

答：近年的言論鉗制手段強、措施越來越具體到位，包括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傳出的蕭殺之風，還真的不是空穴來風。當局鉗制言論自由的手段的確是加強了，措施越來越嚴，也越來越講究實效了。中國傳媒無疑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局面。

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尤其不以傲慢的掌權者的意志為轉移。很多貌似強大的東西，也可能瞬間坍塌，土崩瓦解。當個體面對強權時，似乎很絕望，但仍要在心底默默堅守，盡最大可能去突破、去衝破牢籠。現在微博推特等自媒體、新媒體的發展，我堅信他們鉗制言論的做法註定會破產。為什麼他們的公信力這麼差，沒有人相信，說到底就是鉗制言論自由造成的。

至於說到政改，總理都說到那個份上，把我想說的都說了，已經很到位了。總理說，風雨無阻，至死方休！我想這是肺腑之言，說到點子上了。說到這個份上，還不改，就不知道他們是想幹嘛了。我們只能期待、推動，並把他們好路子上逼。

提問：我想問整改中，媒體被鉗制的情況早就要破產了，那麼會在什麼時候呢？

答：我也很想知道，但我比較悲觀。一切都不確定，未來懸而未決，問題沒有答案。

提問：南都會不會有妥協？您認為媒體獨立的力量怎麼樣才能結合起來、集體突圍？我覺得現在鉗制新聞自由的人也慢慢變成弱勢群體了，當我們提到他們的時候總是當成假想敵，這些人究竟是誰呢？您的報社和維琪解密的終極價值有什麼異同？政治良心到底怎麼解構？您剛才把深圳比作姿色可嘉的美女，臉上有瑕疵，那麼你怎麼評價中國政治治理的姿色和改變呢？南都在香港面世了，您覺得南都在香港的市場會怎樣？有沒有必要出香港版？你為什麼不生氣，不害怕？你說到言論自由、公信力危機，您敢作敢為的風格也使你有人獄的災禍。那麼我們聽你講話，怎麼能不害怕？

最後回答：我很生氣，也很害怕。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很生氣，很憤怒。我對中國出現的很多醜惡現象，對當局鉗制輿論自由的做法，很生氣，很憤怒，相當。我在做出譴責、努力和號召的時候，也有些害怕。但總體上還好，現在的局面總比用槍抵在腦袋上不讓你發言好。我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嘗試，付出的代價是我願意承受的，我曾給自己準備的下場比這糟糕得多。的確，我願意搏一把。這一輩子有這樣的經歷，獲得公眾的認可，比什麼都重要，我很值得。此外，經濟上獨立，實現財務自由也很重要，要能生活得下去，而我做到了這一點。

人間之所以還有希望，人生之所以還值得留戀，是因為作為個體，人有向善的一面，有嫉惡如仇的一面，這是人性中光輝、溫暖的一面，也是人間還有希望的原因。人類美好的品性會把我們拖上更好的道路。我堅信這一點。再見吧，謝謝大家！